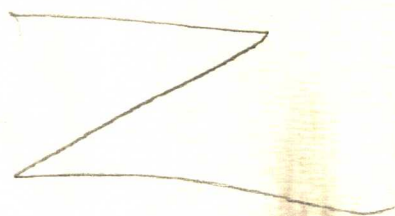


Zhongguo Wenxue
Fazhanshi



中国
文学
发展史

刘大杰 著

中卷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中国文学发展史

刘大杰 著

中卷

Zhongguo Wenxue
Fazhanshi

目 录

第十二章 唐代文学的新发展	1
一 绪说	1
二 唐诗兴盛的原因	2
三 唐代的古文运动	5
四 唐代短篇小说的进展	16
五 唐代的变文	25
第十三章 初唐的诗歌	35
一 齐梁余风	35
二 王绩及其他诗人	37
三 初唐四杰	41
四 沈宋与律体	44
五 陈子昂与诗风的转变	46
第十四章 盛唐诗人与李白	51
一 绪说	51
二 王孟诗派	53
三 岑高诗派	63
四 李白的生平及其作品	69
第十五章 杜甫与中晚唐诗人	79
一 绪说	79
二 杜甫的生平及其作品	80
三 大历诗人与张籍	90
四 白居易的文学理论与作品	95
五 孟韩的诗风	102
六 晚唐诗人	106



第十六章 词的兴起	114
一 词的起源与成长	114
二 敦煌曲词	122
三 晚唐词人温庭筠	124
四 五代词的发展与花间词人	127
五 李煜与南唐词	131
第十七章 宋代的社会环境与文学发展	137
一 宋代的社会环境与文学趋势	137
二 宋代的古文运动	143
第十八章 苏轼与北宋词人	158
一 宋词兴盛的原因	158
二 宋初的词	160
三 词风的转变与都会生活的反映	166
四 苏轼的词	170
五 周邦彦及其他词人	175
六 女词人李清照	180
第十九章 辛弃疾与南宋词人	184
一 时代的变乱	184
二 辛弃疾及其他词人	185
三 格律派词人	195
第二十章 宋代的诗	208
一 宋诗的特色与流变	208
二 欧阳修、苏轼及其他诗人	209
三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	219
四 陆游及其他诗人	226
五 反江西诗派	232
六 遗民诗	238
七 北国诗人元好问	241
第二十一章 宋代小说与戏曲	244
上篇 宋代小说	244
一 志怪传奇的文言小说	244
二 宋代白话小说的兴起	245

三 宋代的短篇小说	248
四 宋代的长篇小说	253
下篇 宋代的戏曲	257
一 中国戏曲的起源与演进	257
二 宋代的各种戏曲	261



一 绪 说

自三国到南北朝,政治上的混乱局面,延长到三百年之久。在这长时期中,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同化,外来的宗教、哲学、艺术以及物产各方面的输入,无论在物质精神方面,都加入了一些新成分,形成了这一阶段文化生活的特色。把这个外在的混乱局面加以统一,在汉族与其他民族融化的基础上而成立集权的中央政府的,是开创隋帝国的文帝杨坚。在这久乱之后,如果能够休养生息,进一步采取一些改良措施,隋帝国的命运是不会这样短促的。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建设,也可以积极开展起来。无奈一到了炀帝,便形成那种严重的内荒淫而外浪费的局面,形成残酷剥削人民、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局面,于是那基础本不稳固的帝国生命,便很快地断送了。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说:“隋文帝因周氏平齐之后,府库充实,庶事节俭,未尝虚费。开皇之初,议者以比汉代文、景,有粟陈贯朽之积。炀帝即位,大纵奢靡,加以东西行幸,舆驾不息。征讨四夷,兵车屡动。……数年之间,公私罄竭。财力既殫,国遂亡矣。”可知文帝时代,社会经济已大好转,如果炀帝对当日恢复过来的社会生产力不予以根本性的破坏摧残,隋帝国的生命,决不会那么昙花一现。在这种情势下,真能在政治文化的建设上,创造出巨大的成就来的,不得不待之于继隋而起的唐朝。

封建统治者鉴于炀帝暴政统治下人民反抗之激烈,农民起义军威力之强大,从历史上得到“以古为鉴”的教训,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安定社会、发展经济的积极措施以缓和阶级矛盾。由贞观到开元有将近百年的休养生息,经炀帝一手破坏的社会经济与劳动生产力,又恢复转来,而达到高度的繁荣。在这种繁荣中,唐帝国建立了稳固的基础。于是文教武功以及新的民族实





力,都得以充分地发扬光大。由唐代所设的六都护观之,中国当日的势力,东北至黑水、渤海,西至大宛、康居及月氏、波斯,北至坚昆,南至安南一带,其声势已远在秦、汉以上了。由儒、释、道三教的并盛,与袄教、摩尼教、回教的流布,形成思想界的活跃与自由。因陆海交通的频繁,运河、长江的便利,直接促进国内商业经济与国际贸易的发达,形成都市的繁荣与市民阶层的成长;间接也就促进本国文化与外族文化的交流。当日如日本、新罗、百济、高昌、吐蕃诸邦,都派遣僧徒学子来唐留学,极一时之盛。从汉朝以来,唐朝是第一个强大有力的帝国,是东亚文化的代表。民族具有一种创造的精神与革新的毅力,再加以外来文化的激荡交流,于是音乐、绘画、雕刻、建筑各方面,都呈现着显著的进步。尤其是印度文化,继汉、魏、六朝之后,有更进一步的接触与融和,对于中国文学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。

诗是唐代文学的代表,这是人人所知道的。诗以外如古文运动的兴起,传奇的盛行,变文的出现,词的形成,都是唐代文学的新发展。词的产生,在中国韵文史上开辟了一个新局面,是一件重大的事,所以关于它的起源和发展,将在另一章里独立叙述。再如北齐时代受着外来乐舞的影响而出现的“代面”、“拨头”与“踏摇娘”以及唐代的“参军戏”等等,自然都是戏曲史上的重要材料,究因成就尚微,只好等到讨论宋、元戏曲的时候,再来补述。

二 唐诗兴盛的原因

唐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。形式方面,无论古体律绝,无论五言七言,都由完备而达全盛之境。内容的丰富,风格的多样,派别的分立,思潮的演变,呈现着万花撩乱的景象。宋计有功撰《唐诗纪事》,所录凡一千一百五十家。清代所编纂的《全唐诗》,所录共二千余家,录诗共四万八千九百余首。但也并非唐诗之全部,其遗佚的尚有不少。在这些书里,自帝王、贵族、文士、官僚,以至和尚、道士、尼姑、歌妓,都有作品。可知诗歌在唐朝,成为一种最普遍的文学形式,不只是少数文士的专利品。诗在唐朝这么蓬勃地发达起来,自必有种种相依相附的原因。

一、诗人地位的转移 唐诗的主要特色,是其内容包含的丰富,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,而在诗歌艺术上,得到了高度的成就。通过诗歌的丰富内容,我们可以看出当日社会生活与人民思想感情的表现。在那些作品里,无论大地山河、战场边塞、农村商市,以及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,政治的现状,历史的



题材,阶级的对立,妇女的遭遇等等,无不加以描写。因此扩大了诗的境界,丰富了诗的内容,加强了诗的生命,提高了诗的地位。这种进步的现象,是唐以前的诗歌所没有的。这因为往日的诗坛,除了少数的民歌以外,大部分是掌握在君主贵族的手里。他们都是养尊处优,缺少社会生活的体验,尤其缺少对穷苦人民情感、生活的接触与了解。他们拿起笔,大都只能倾心于文学的辞藻与形式,表现他们那种特有的狭隘的宫廷风尚与贵族的上层生活。试看《古诗十九首》的作者大都接近民间,因此在那些作品里,就能反映一些现实社会的面貌。建安文学之有价值,就在于他们还能正视现实,学习民歌的创作精神。到了两晋、南北朝,门阀之风极盛,文坛几乎尽为贵族所占据。上行下效,彼此附和。谈玄大家谈玄,信佛大家信佛,做宫体诗大家做宫体诗。他们的生活,同民众相隔千万里,民众的痛苦,他们不能了解,也无从了解。在这种情状下,他们的作品的内容自然是贫薄,诗的情感,大都是限于那特殊阶级的情感。由两晋一般的游仙文学,梁、陈的宫体文学看来,便可了解作品中的内容是如何的空虚,更可了解那特殊阶级的生活情感,同民众的生活情感,距离得多么远。晋及南北朝诗人,只有左思、陶渊明、鲍照出身较为穷困,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,时时闪露出现实社会的深厚色彩。才情固然不能否定,但社会人生的实际感受和进步的思想,对于文学的成就更为重要。到了唐代的诗人,这情形就两样了。那一批有名的作家,都不是君主贵族的特殊阶级,大半是来自中下层社会,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与对现实社会的认识。我们试检阅一下高适、岑参、王昌龄、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柳宗元、孟郊、张籍、元稹、白居易、李商隐、皮日休、聂夷中、杜荀鹤诸人的历史,便会知道他们都经过困顿或流浪生活的磨练。由于他们多来自中下层,对于社会现实、对于人民生活有一定的体验;必要有了这样的生活、思想基础,才能正确地学习、继承文学遗产的优良传统,才能在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、乐府歌辞中吸取反映现实的创作精神。六朝诗人的集子里,乐府作品很不少,他们也不是不学习乐府;那时的阶级斗争,也非常尖锐,但因为他们都浮在上层,所以在作品中只能略具乐府的形貌,而没有乐府的真实内容。唐代诗人善于学习文学遗产中的精华,艺术技巧固然是其中的一面,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具有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,具有现实生活的基础,才能理解、掌握和运用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、乐府民歌中的进步的创作方法。也正因如此,他们才能在唐代各阶段的阶级矛盾、阶级斗争的人民生活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斗争中,吸取现实性、政治性的题材,以优秀的艺术技巧,写出形式多样、风格多样、内容充实的诗歌。同时,由于唐代用科举考试,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,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,通过考试,可以登上政治舞台;其目的虽是使



“天下英雄入吾彀中”，为封建统治者服务，但客观上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，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，而形成一个文化发展、思想解放的新时代。从前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，在政治上文化上既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，于是文学的创作，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，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与感情，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。从君主贵族所掌握的诗坛，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充实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。

二、政治背景 在封建社会君主集权时代，政治势力，给予文学以一定的影响。汉代的赋，梁、陈时代的宫体文学，我们都可看出政治势力与文学的相互关系。唐代几个有权力的皇帝，不仅都爱好文艺音乐，并大加提倡。太宗先后开设文学馆、弘文馆，招延学士，编纂文书，倡和吟咏。高宗、武后，更好乐章，常自制新词，编为乐府。中宗时代，君臣赋诗宴乐，更时有所闻。

中宗正月晦日，幸昆明池赋诗，群臣应制百余篇。帐殿前结彩楼，命昭容（上官婉儿）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。从臣悉集其下，须臾纸落如飞，各认其名而怀之。（《唐诗纪事》）

神龙之际，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，金吾弛禁，特许夜行。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，无不夜游。车马骈阗，人不得顾。王主之家，马上作乐以相夸竞，文士皆赋诗一章，以纪其事，作者数百人。（《大唐新语》）

到了玄宗，这种风气更盛。他自己是诗人、乐师兼优伶，爱好文艺，附庸风雅。在新旧《唐书》的《音乐志》《礼乐志》内，有不少他与臣妃倡和的记载。其他帝后，亦多爱好诗歌，提奖后进。如宪宗召白居易为学士，穆宗征元稹为舍人，都是以诗识拔。文宗因爱好诗歌，特置诗学士七十二人。白居易死后，宣宗作诗云：“缀玉联珠六十年，谁教冥路作诗仙。浮云不系名居易，造化无为字乐天。童子解吟《长恨》曲，胡儿能唱《琵琶》篇。文章已满行人耳，一度思卿一怆然。”当日的君主，这样对待诗人，一面是增加诗人的声誉，同时又给后起士子以鼓舞。这种现象在封建社会里，对于文艺的发展，很能起一些刺激作用。加之唐代以诗取士，于是诗歌一门，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捷径，与明、清两代的制艺相同，作为当日青年士子的必修科目。以诗取士，格于歌颂的内容与形式的限制，自然难得有精彩的作品。但这种考诗的制度，提倡作诗的风气，对加强诗歌技巧的训练，对诗歌的普及，有重要作用。杨慎《升庵诗话》引胡子厚云：“人有恒言曰：唐以诗取士，故诗盛……此论非也。诗之盛衰，系于人之才与学，不因上之所取也。”王世贞也说：“人谓唐以诗取士，故诗独工，非也。凡省试诗类鲜佳者。”（《艺苑卮言》）他们这些意见，似是而实非，因为都忽视了考



诗制度对于诗歌技巧普遍训练的作用。诗歌技巧的普遍训练,是诗歌繁荣的一项准备工作。《全唐诗》序说:“盖唐当开国之初,即用声律取士,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,悉从事于六义之学,以为进身之阶,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。而又堂陛之賡和,友朋之赠处,与夫登临宴赏之即事感怀,劳人迁客之触物寓兴,一举而托之于诗,虽穷达殊途,悲愉异境,而以言乎摅写性情,则其致一也。”这样的说明,较之胡、王诸人的议论来,就显得全面一些了。

三、诗歌形式的发展 某一种文学在某一时代的兴衰,其内在的历史原因,固然是复杂多端,然其形式的发展,也起着一定的作用。文学形式为内容所决定,与历史环境发生密切联系。只有适合于文学内容的要求,形式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。如四言诗萌芽于周初,全盛于西周、东周之际,而衰于秦、汉,后代虽偶有作者,如曹操的《短歌行》,固然独具特色,但究因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,终无法挽回那已成的颓局。辞赋的命运也是如此。五言古诗起于汉代,盛于魏、晋、南北朝。这都说明了文学形式发展的历史意义。至如七言古诗及律体、绝句的新体诗,在六朝时代,才开始形成,形体、音律,初具规模。到了唐代,阶级矛盾和政治斗争日益发展,社会生活日益复杂,诗人的思想感情也更为丰富,在诗歌创作上,新的内容,要求新的形式。唐代诗人们,正好运用新兴的形式,来施展自己的才能。加以辞赋一体,久已僵化,传奇文学,兴起较迟,于是唐代文人的创作,主要集中精力于诗歌。从这一点来说,对于唐诗的繁荣兴盛,特别是表现在唐诗多种多样的诗歌形式的优美成就上,是有一定的意义的。

三 唐代的古文运动

中国文学观念的解放,起于建安,经过陆机、葛洪、刘勰、萧统、钟嵘诸人的发挥讨论,在文学理论上得到很大的成就。但这一时期的创作倾向,无论诗文书赋,大都偏重声律、形式与辞藻的美化,形成中国文学史上柔靡浮艳的文风。其间虽也有刘勰、钟嵘、裴子野、苏绰、李谔诸人的批判和反抗,隋初甚至还对撰述“华艳”文表者予以处分,究竟风气已成,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。所谓真正的文学改革,不得不待之于唐朝了。关于诗歌的革命,留在后面再说;现在所要讲的是由韩愈、柳宗元所代表的反对六朝骈文的古文运动。

在韩愈之前,首先反对六朝文风的是王通的《中说》。《中说》是否为王通所撰,虽有人怀疑,即使出其门人或其子孙,总还是一本隋末唐初的作品。在

那里面所表现的文学观念,我们可看作是排击六朝文学建立教化、实用文学的先声。

言文而不及理,是天下无文也。王道从何而兴乎?吾所以忧也。

(《王道》篇)

古君子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而后艺可游也。……古之文也约以达,今之文也繁以塞。(《事君》篇)

薛收曰: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。上明三纲,下达五常,于是征存亡,辨得失;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,君子赋之以见其志,圣人采之以观其变。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,是夫子之所痛也。(《天地》篇)

子曰:学者博诵云乎哉,必也贯乎道;文者苟作云乎哉,必也济乎义。(《天地》篇)

他在这里,一则说“王道”,再则说“志于道”、“贯乎道”,可知文以载道的观念,实由《中说》的作者开其端绪,也即以儒家的道统作为评量文章的要旨。其次,他不仅攻击六朝的文风,还鄙斥六朝的文人,对谢灵运、沈约、谢朓、吴筠(按应作吴均)、谢庄、王融、湘东王兄弟、徐陵、庾信、刘孝绰兄弟、江总诸人,都进行了指责(《事君》篇)。而他的文学主张则崇尚“约以则”与“深以典”,强调重道轻艺,重行轻文。其内容必须“上明三纲,下达五常”,表现了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正统的儒家思想。

再如唐初的史家,如李百药(《北齐书》)、魏徵(《隋书》)、姚思廉(《梁陈书》)、令狐德棻(《周书》)、李延寿(《南北史》)诸人,在检考前代的兴衰得失时,一致认为六朝的淫靡文风,给予政治以不良的影响。于是都借着《文苑传》《文学传》的序文,来攻击六朝文学的风气,同时又发挥宗经、尊圣、辅助教化、切合实用的儒家传统的文学理论。

自汉魏以来,迄乎晋宋,其体屡变,前哲论之详矣。暨永明、天监之际,太和、天保之间,洛阳江左,文雅尤盛。……然彼此好尚,互有异同。江左官商发越,贵于清绮;河朔词议贞刚,重乎气质。气质则理胜其词,清绮则文过其意。理深者便于时用,文华者宜于咏歌,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。若能掇彼清音,简兹累句,各去所短,合其两长,则文质彬彬,尽善尽美矣。梁自大同之后,雅道沦缺,渐乖典则,争驰新巧。简文、湘东,启其淫放;徐陵、庾信,分路扬镳。其意浅而繁,其文匿而彩。词尚轻险,情多哀思。格以延陵之听,盖亦亡国之音乎?(魏徵《隋书·文学传序》)

唯王褒、庾信,奇才秀出,牢笼于一代。……由是朝廷之人,间阎



之士，莫不忘味于遗韵，眩精于末光。犹丘陵之仰嵩、岱，川流之宗溟、渤也。然则子山之文，发源于宋末，盛行于梁季，其体以淫放为本，其词以轻险为宗，故能夸目侈于红紫，荡心逾于郑卫。昔扬子云有言：“诗人之赋丽以则，词人之赋丽以淫”，若以庾氏方之，斯又词赋之罪人也。（令狐德棻《周书·王褒庾信传论》）

夫文学者盖人伦之所基欤？是以君子异乎众庶。昔仲尼之论四科，始乎德行，终于文学，斯则圣人亦所贵也。（姚思廉《陈书·文学传论》）

他们都是唐初人，语气虽有轻重之别，但其主旨，却都是鄙薄六朝文学的华靡，要建立一种切于实用的散文。穷其源必趋于复古，论其用必合于教化。他们或是政治家、历史家，由他们这些理论看来，知道在初唐时代的学术界，要求文学改革的呼声，已是很普遍的了。

唐代的古文运动，世人只注意韩愈、柳宗元，然在韩、柳之前，已有陈子昂、李华、萧颖士、元结、梁肃、独孤及、柳冕诸人提倡古体，不过尚未形成一个有力的运动。但柳冕的文学理论，实为韩、柳古文运动的先驱。柳冕字敬叔，河东（今山西永济）人，贞元中官福州刺史，《全唐文》中录其文。他的文学观念，强调尊圣、宗经，要以封建的儒道来指导文学。指出文学衰弊的原因，是由于“六艺之不兴，教化之不明”。因此，他对于屈原、宋玉以下的诗文辞赋，一概在轻视之列。他说：

文章本于教化，形于治乱，系于国风。故在君子之心为志，形君子之言为文，论君子之道为教。《易》云：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，此君子之文也。自屈、宋以降，为文者本于哀艳，务于恢诞，亡于比兴，失古义矣。虽扬、马形似，曹、刘骨气，潘、陆藻丽，文多用寡，则是一技，君子不为也。（《与徐给事论文书》）

自成、康没，颂声寝，骚人作，淫丽兴，文与教分而为二。教不足者强而为文，则不知君子之道，知君子之道者则耻为文。文而知道，二者兼难。兼之者大君子之事，上之尧、舜、周、孔也，次之游、夏、荀、孟也，下之贾生、董仲舒也。（《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》）

他在这里初步建立了道统文学的理论，把文学与儒道合而为一，其余如文章的技巧辞藻，都看作是枝叶，因此尧、舜、周、孔成为文学家的正统，扬、马、曹、刘之徒都不能同贾谊、董仲舒并列了。基于这种理论，他反对政府以诗取士，反对政府重用文人，并认为应当尊经术重儒教，才是正当的办法。他说：

进士以诗赋取人，不先理道；明经以墨义考试，不本儒意；选人以

书判殿本，不尊人物；故吏道之理天下，天下奔竞而无廉耻者，以教之者末也。（《与权德舆书》）

相公如变其文，即先变其俗。文章风俗，其弊一也。变之之术，在教其心，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。伏维尊经术，卑文士。经术尊则教化美，教化美则文章盛，文章盛则王道兴，此二者在圣君行之而已。（《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》）

他这种理论，不仅为韩愈所本，也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千余年来道统文学的定论。贵古贱今之说，尊圣宗经之论，深入于读书人士的心中。经史一类的文章，成为文学的正宗，诗词、小说、戏曲等类作品，反而得不到地位。但柳冕虽有理论，散文创作的成绩并不好，因此不能发生大影响。他自己说：

小子志虽复古，力不足也。言虽近道，辞则不文。虽欲拯其将坠，末由也已。（《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》）

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，纵文之不能至之。况已衰矣，安能鼓作者之气，尽先王之教？（《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》）

他这种态度是很真实的。“言虽近道，辞则不文。”正是说明他的创作力量不足。因此唐代古文运动的完成，不得不待之于韩、柳了。韩、柳的成就，是因为他们既有理论，又有优秀的创作成绩。有了成绩，理论才得到实践，才能得到世人的信仰与拥护；有了群众基础，才能形成有力的运动。李汉讲韩愈做古文时说：“遂大拯颓风，教人自为，时人始而惊，中而笑且排，先生益坚，终而翕然随以定。”（《昌黎先生集序》）可知当日在那个运动中，时人对他或加讥笑，或加排击，然他能以坚定的自信心，勇往直前，一面以理论宣传，一面以作品示人，终于得到最后的胜利。李汉说他“先生于文，摧陷廓清之功，比于武事，可谓雄伟不常者矣”。他这几句话，并没有夸张。韩愈当日对于根深蒂固的骈文阵线的宣战，新散文的建立，确有一种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，确有一种摧陷廓清的功绩与雄伟锋利的力量，因而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。

韩愈 韩愈（768—824），字退之，邓州南阳（今属河南）人。昌黎为其郡望，故世也称韩昌黎。他幼时孤苦，刻苦自学。《新唐书》本传说：“愈生三岁而孤，随伯兄会贬官岭表。会卒，嫂郑鞠之。愈自知读书，日记数千百言。比长，尽能通六经百家学，擢进士第。”元和十三年，韩愈因谏迎佛骨，几处死刑，后贬潮州刺史。官至吏部侍郎。他为人耿直，情谊深厚，尤喜提携同辈，奖励后学。《旧唐书》本传说：“愈性弘通，与人交，荣悴不易。少时与洛阳人孟郊、东郡人张籍友善。二人名位未振，愈不避寒暑，称荐于公卿间。……而颇能诱励后进，馆之者十六七，虽晨炊不给，怡然不介意。”他这种胸怀和态度，对于作为一





个文学运动的领导者来说,是非常必要的。

韩愈是唐代重要的思想家,是司马迁以后杰出的散文家。他的学术思想是尊儒排佛,他的文学观念是反骈重散。因此他极不满意六朝以来的学术空气与华艳无实的文风。他主张思想要回到古代的儒家,文体也回到朴质明畅的散体。他在《进学解》中,列举五经子史之书,是他的文学模范。所谓非三代、两汉之书不敢观,便是这种意思。又因为反对六朝文学中那种艳冶的淫靡之风,所以主张文学为贯道之器,也就是要有内容。他认为文学离开了伦理便没有价值,离开了教化便没有功用。他在《答李翊书》中说:“行之乎仁义之途,游之乎《诗》《书》之源,无迷其途,无绝其源,终吾身而已矣。”仁义诗书合而为一,便是文道合而为一。因文见道,因道造文,二者并重,不容分开。故他说:

然愈之所志于古者,不惟其辞之好,好其道焉尔。(《答李秀才书》)

愈之为古文,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?思古人而不得见,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;通其辞者,本志乎古道者也。(《题欧阳生哀辞后》)

读书以为学,缣言以为文,非以夸多而斗靡也。盖学以为道,文所以为理耳。苟行事得其宜,出言适其要,虽不吾面,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。(《送陈秀才彤序》)

在这些话里,可以知道韩愈的主张,是为道而学文,为道而作文。文不能贯佛、道的内容,要贯儒、道的内容;文体是反对六朝的骈俪,而要用三代、两汉的散体。他的强调儒学、争取道统,当然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,在当时佛学流行、文风华丽的历史环境里,他这些理论,也还能起一点排佛反骈的作用。他当时从思想上和经济的观点上,敢于违反统治者之所好,积极地毫无畏惧地反对佛教,几乎牺牲生命,这一点还是可取的。

韩愈不仅宣传他的理论,更重要的是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散文。他是司马迁以后杰出的散文家。他虽号召复古,他的散文实际是革新。在古代散文的基础上,创造发展,形成一种富于逻辑性与规范性的文体。这种文体,宜于说理、叙事、言情,成为中古以来最流行的切合实用的散文形式,就是对于当时的传奇文学,也起了一定的影响。他主张作文“言必己出”,“务去陈言”,反对剽窃,强调语言的创造性,又力求“文从字顺”,这都很有意义,并对后世产生重大的影响。在他的散文里,广泛地反映出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被压迫的悲哀和郁郁不平的情感,以及对于佛老思想的反抗。语言的特色,是精炼有力,气势雄伟,条理通畅,表现深刻。如《原毁》《师说》《马说》《画记》《张中丞传后叙》



《柳子厚墓志铭》《送孟东野序》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《毛颖传》及《蓝田县丞厅壁记》等篇,是他的代表作品。今举他的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为例:

太行之阳有盘谷。盘谷之间,泉甘而土肥,草木蓂茂,居民鲜少。或曰:“谓其环两山之间,故曰盘。”或曰:“是谷也,宅幽而势阻,隐者之所盘旋。”友人李愿居之。愿之言曰:“人之称大丈夫者,我知之矣。利泽施于人,名声昭于时,坐于庙朝,进退百官,而佐天子出令。其在外,则树旗旄,罗弓矢,武夫前呵,从者塞途,供给之人,各执其物,夹道而疾驰。喜有赏,怒有刑,才峻满前,道古今而誉盛德,入耳而不烦。曲眉丰颊,清声而便体,秀外而惠中,飘轻裾,翳长袖,粉白黛绿者,列屋而闲居,妒宠而负恃,争妍而取怜。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,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。吾非恶此而逃之,是有命焉,不可幸而致也。穷居而野处,升高而望远,坐茂树以终日,濯清泉以自洁。采于山,美可茹,钓于水,鲜可食,起居无时,惟适之安。与其有誉于前,孰若无毁于其后?与其有乐于身,孰若无忧于其心?车服不维,刀锯不加,理乱不知,黜陟不闻。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,我则行之。伺候于公卿之门,奔走于形势之途,足将进而趑趄,口将言而嗫嚅,处秽污而不羞,触刑辟而诛戮,徼幸于万一,老死而后止者,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!”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。与之酒,而为之歌曰:“盘之中,维子之官。盘之士,可以稼。盘之泉,可濯可沿。盘之阻,谁争子所。窃而深,廓其有容,缭而曲,如往而复。嗟盘之乐兮,乐且无央。虎豹远迹兮,蛟龙遁藏。鬼神守护兮,呵禁不祥。饮且食兮寿而康,无不足兮奚所望。膏吾车兮秣吾马,从子于盘兮,终吾生以徜徉。”(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)

作者以锋利的笔力,锤炼的语言,对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命运,谄媚逢迎的官僚士大夫的生活面貌,以及怀才不遇者的悲愤心情,作了深刻生动的描写。题目是写李愿,同时也是写韩愈自己的胸怀。苏轼非常赞美这篇文章,给它很高的评价。

其他如《师说》针对当日不重师道的风气,提出了“弟子不必不如师,师不必贤于弟子,闻道有先后,术业有专攻”的进步见解。《张中丞传后叙》着重侧面的描写,通过一些遗闻轶事,表达出张巡、南霁云诸人的爱国思想和坚强性格。《柳子厚墓志铭》从正面着笔,以非常概括有力的语言,描写柳子厚的一生遭遇、文章成就和他们两人的深厚感情。《原毁》一篇,说理透彻,富于逻辑。这些文章,语言精炼,生气流动,笔力遒劲,章法浑成,都是韩文中富有代表性



的作品。再如《祭十二郎文》，以深挚的叔侄之情，话家常，叙身世，并联系到自己的不幸遭遇，既亲切，复沉痛，并于生动自然之中显得格局紧健，笔力奔放，是抒情散文中的佳作。

柳宗元 柳宗元(773—819)，字子厚，河东(今山西永济)人。贞元初举进士，后为监察御史。顺宗李诵时，柳宗元参加王叔文的比较进步的政治集团，后因失败，贬永州司马，继迁柳州刺史，接近少数民族，颇著政绩。死于柳州。《新唐书》本传云：“既窜斥，地又荒疠，因自放山泽间。其堙厄感郁，一寓诸文，仿《离骚》数十篇，读者咸悲恻。”柳宗元这种悲苦的境遇，对于他的文学成就，有很大的影响。

柳宗元是韩愈古文运动有力的支持者、宣传者。韩立论过于重道，柳则较为重文，然在文体的驳论文与重散体这一点上，两人却是一致的。柳本好佛，虽论文也主宗经，而其思想范围则较韩愈为广阔而深厚。他说：

始吾幼且少，为文章以辞为工。及长，乃知文者以明道，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，务采色，夸声音，而以为能也。……本之《书》以求其质，本之《诗》以求其恒，本之《礼》以求其宜，本之《春秋》以求其断，本之《易》以求其动，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。参之《穀梁》氏以厉其气，参之《孟》《荀》以畅其支，参之《庄》《老》以肆其端，参之《国语》以博其趣，参之《离骚》以致其幽，参之太史以著其洁，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也。(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)

读书及文章，辞意良高，所向慕不凡近，诚有意乎圣人之言。然圣人之言，期以明道，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。辞之传于世者，必由于书，道假辞而明，辞假书而传，要之之道而已耳。道之及，及乎物而已耳。(《报崔黯秀才书》)

柳氏虽一再以“明道”为言，然而他对于道的解释，较韩愈所说的要广泛得多。他觉得一面要在古书里求圣人之道，同时又要求其辞。求诸辞而遗其道固然不可，只求诸道而遗其辞，也是不可。柳宗元的道，一是古人所讲的道德的道，一是古人作文的艺术之道。他所说参《孟》《荀》以畅其支，参《庄》《老》以肆其端，参之《离骚》以致其幽，参之太史以著其洁，都是说的作文之道，那是非常明显的。柳宗元的优秀作品，都产生在贬谪以后。由于他深入社会，接近人民，在他的作品里，反映了穷苦人民的生活感情。他的作品首先使我们注意的，是他的寓言。这些寓言大都是写动物故事，短小警策，意味深远，含蓄犀利，富于讽刺文学的特色。如《三戒》《罾说》《螾蜃传》等作，都有深刻的教育作用和现实意义。



螾蟥者，善负小虫也。行遇物，辄持取，卬其首，负之，背愈重，虽困剧不止也。其背甚涩，物积因不散，卒蹶仆，不能起。人或怜之，为去其负，苟能行，又持取如故。又好上高，极其力不已，至坠地死。今世之嗜取者，遇货不避，以厚其室，不知为己累也。唯恐其不积，及其怠而蹶也，黜弃之，迁徙之，亦以病矣。苟能起，又不艾，日思高其位，大其禄，而贪取滋甚，以近于危坠。观前之死亡不知戒，虽其形魁然大者也，其名人也，而智则小虫也，亦足哀夫！（《螾蟥传》）

在《螾蟥传》这一篇短文里，作者以简练的文笔，将封建社会中一些贪残无厌的卑劣现象，作了辛辣的讽刺。和他的《骂尸虫文》一样，都是借小虫来宣泄他愤世的激情。他的论说文也很有特色，如《天说》《封建论》诸作，以唯物论观点，批判封建传统和封建政治的不合理，文笔锋利有力，思想价值很高。

寓言以外，柳宗元的短篇传记也是非常优秀的。这些短篇传记，不是取材于上层社会的英雄人物，而是描写一些市井细民和工农群众，通过他们，揭露了封建政治的黑暗和穷苦人民的苦痛。《宋清传》《种树郭橐驼传》《童区寄传》《捕蛇者说》等篇，是他的代表作。作者能在这些人物身上取材落墨，就已表现出他识见的杰出。特别是《捕蛇者说》，文末以“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”作结，对于剥削政治的无情谴责，尤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。

柳宗元的山水文有两个特色：一，他不是客观的为了欣赏山水而写山水，而是把自己的生活遭遇和悲愤感情，寄托到山水里面去，使山水人格化感情化，因此在他的山水文里，仍然反映出作者在其他散文中一贯的思想内容；其次，他在山水的描写上，有细微的观察与深切的体验，运用最精炼的笔锋，清丽的语言，把山水的真实面貌，刻画出来。形象生动，色泽鲜明，诗情画意，宛然在目，成为山水散文的杰作。兹录《钴鉞潭西小丘记》为例：

得西山后八日，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，又得钴鉞潭。西二十五步，当湍而浚者为鱼梁，梁之上有丘焉。生竹树，其石之突怒偃蹇，负土而出，争为奇壮者，殆不可数。其嵌然相累而下者，若牛马之饮于溪；其冲然角列而上者，若熊黑之登于山。丘之小不能一亩，可以笼而有之。问其主，曰：“唐氏之弃地，货而不售。”问其价，曰：“止四百。”余怜而售之。李深源、元克己时同游，皆大喜，出自意外。即更取器用，铲刈秽草，伐去恶木，烈火而焚之。嘉木立，美竹露，奇石显。由其中以望，则山之高，云之浮，溪之流，鸟兽鱼之遨游，举熙熙然，回巧献技，以效兹丘之下。枕席而卧，则清冷之状与目谋，涓涓之声与耳谋，悠然而虚者与神谋，渊然而静者与心谋。不匝旬而得地者二，